

辞书研究丛书

辞书和信息

陈 原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丛书

辞书和信息

陈 原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封面设计：江小铎

辞书和信息

陈 原著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78,3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7187·2 定价：1.10元

《辞书研究丛书》前言

我国的辞书事业，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构成部分，辞书编纂实践和辞书理论研究日益为进展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

本丛书在《辞书研究》双月刊继续编辑出版的同时，陆续编辑出版，目的是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从而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在开创辞书研究的新局面中多贡献一份力量。

在辞书研究这一总的主题下，随着辞书编纂实践的不断扩展辞书领域和提出新的课题，本丛书的选题必然是多样的。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也必将促使本丛书不断有所前进和有所丰富。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编辑部

1984年10月

前记

1980年的春节，我把自己关在八米斗室中整理自己的笔记本；其时忽发“豪兴”，穷一日一夜之力，把那几年积累下来对词书编纂和语汇学的零碎意见写下来，那就成了一篇三不象的文章：《释“一”》。说它是杂文吧，行文既不隽永又不泼辣；说它是学术论文吧，却没有严谨的系统性，且别提独到的创见了；说它是工作报告吧，又加添了不少抒情笔调。创刊不久的《辞书研究》却不管它多么不伦不类，居然把它登出来了——誉之者说是“别开生面的学术文章”，毁之者斥为“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至于我，在其后四年的春节都自讨苦吃把自己关起来，每年写一篇这种“不知所云”的随感录。今年春节写成《释“九”》，共得五篇，似乎“黔驴技穷”，感想都写完了，故集结成册，公之于众，就教于勤奋地默默地埋头词书编纂工作的学人们。

编入本书的另外五篇文章，是我涉猎语言信息论和语言控制论时有关现代汉语和信息交换问题的一些札记，称不上学术文章，只不过是一时的心得体会。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而语言本身又是社会的信息系统——由于这些内容不是专业论文，且又同编纂词书的理论与实践息息相关，因此也汇编在这里。

附录九篇，大都是发言、演讲、报告、汇报的记录或草稿，

其中有一两篇是“释”文的“原型”(例如第2篇与《释“典”》一文),另一部分则是带有史料性质的材料(例如第7篇是劫后幸存的1959年为一个小会写的讨论材料;第8篇是1975年为准备词典规划会议所作的“汇报提纲”)。凡是史料性质的材料,都不作任何修改,照原样收录,以存其真——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我自己当时的见解(有对的,有错的,有模模糊糊和故意说得猜谜语似的),正所谓刻下了时代的烙印。最后一篇附录《抒怀》,描述了和表达了四卷本《辞源》出齐之时我的感激心情。我没有能力参加《辞源》的实际编纂工作,但我作为一个热心的鼓吹者和责无旁贷的组织者,同千百位无名英雄共甘苦,走完这九年“艰苦的历程”——从不寻常的1975年开始,共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跋涉过多少绝壁险滩,然而毕竟走过来了,到达了终点,真不容易呀,不由得不百感交集——这就是“抒怀”。写完《抒怀》,我松了一口气,也许康庄大道就展现在面前了,故把它放在书末——算做结束自己的一个“时期”吧。

陈 原

1984年2月25日

目 录

| | |
|--|-----|
| 《辞书研究丛书》前言 | I |
| 前记 | i |
| 1) | |
| 释“一” | 1 |
| 释“大” | 23 |
| 释“鬼” | 43 |
| 释“典” | 67 |
| 释“九” | 86 |
| 2) | |
| 语言和信息 | 105 |
| 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模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大 信息量和最佳效能 | 114 |
| 现代汉语正词法与信息交换 | 131 |
| 关于现代汉语正词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 140 |
| 附：《汉语拼音方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146 |
| 3) | |
| 附录 | |
| 1. 关于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 (1978) | 149 |
| 2. 词书与社会生活 (1982) | 172 |

| | |
|---|-----|
| 3. 《汉语大词典》编写 (1980) | 183 |
| 4. 《汉语大词典》的历史使命 (1981) | 205 |
| 5. 关于地名词典 (1982) | 215 |
| 6. 关于《汉语外来语词典》 (1978) | 223 |
| 7. 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步设想 (史料· 1959) | 226 |
| 8. 关于词典工作的若干问题和若干提法 (史料· 1975) | 229 |
| 9. 《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 (1984) | 239 |

释 “—”

——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随想

1

“一”是汉字中笔划最少，结构最简单，最常用和常见的字，有点象拉丁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a。小学生上学，拿到语文教科书第一册，翻开第 1 页，读第一课——他最初遇到的一个汉字（不一定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在按部首排列（或者说，不用号码、音序或笔形排列）的词典中，“一”字总是排在第一页第一个位置上。《辞源》，《辞海》以及它们历次的修改本，都是这样安排的。一千几百年前许慎编《说文解字》，“一”字也是放在“第一”（上）的第一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的一般用法、含义，好象是什么人都说得出来；但是“一”的特殊用法、含义，那就不一定了。至于以“一”字作为字头所构成的语词和术语，那就更多了，它们的含义也就不一定一看就懂了。所以，一部字典（词典）该收那些字，那些词，不收那些字，那些词，收多收少，解释到什么程度，这都要按照这部词典的方针任务和规模，分别情况作出规定，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象“一”这样的常见字、常用字，仿佛谁都一看就懂得的字，收不收进语文词典，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那证据便是：没有一本词典不收“一”字。

在动乱的十年间，特别是当一些不搞语文，完全不研究语词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同志们进入词典编纂领域时，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场合里曾经进行得很热闹。当时代表“革新”者的一派意见，认为词典不应收常见字(词)。“谁会在字典里查个‘一’字呀？”可也是。当时代表“守旧”或“复辟”者的一派意见，认为既是词典(或更准确地说，一般语文词典)，什么字都应当收，“一”字也不例外。前者激烈反对，说，一呀，二呀，三呀，四呀，人呀，手呀，桌椅板凳呀，葱姜油盐呀，这些字或由这些字构成的词，如大葱，生姜，菜油呀等等，以至老师，学生，爸爸，妈妈之类，都不必收在字典(词典)里——他们那时把问题一下子提到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阐述。比如说，只有地主才分不清什么是大葱，生姜，贫下中农对这些词儿太熟悉了，用不着查；因此，如果一部词典收进这些据说只有地主才知道的词儿的话，那么，这部词典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从政治路线上说，这就叫做复辟，等等。这种“理论”自然是荒谬的，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但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学理上探索词典该不该收最常用的字(词)这个问题，倒也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我是收录派。在几次会议上我发表过意见，后来综合起来收在我那篇《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一期)^①里，但那里比较多的是从政治上立论的，我想，还可以从词典编纂学的角度加以阐述。我以为，在一般(通用)语文词典中应当收录最常见的字(词)，有几层意思：

头一层意思，词典(字典)是语言现象的记录——或者说，词典(字典)是人类社会语言现象中特别是其中词汇现象和表

^① 见本书149页。

现法的记录。这里所谓记录，包括整理的意思在内；不是单纯的机械“记录”。凡是社会语言中拥有的词汇，都应当不分它的难易或常见程度，收进词典（字典）中去；当然，要按对象和规模来决定所收词汇的范围和数量——但是数量的起点不是多少生僻字，而是常用字。词典不是专门论文，它没有权利排除习惯用的语言现象，正相反，它只能按照一般的以及特殊的规律，来阐发或解释这种即使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因为它的任务是对特定范围的社会语言现象的系统描述、整理和加以规范化。词典也不是语文课本，语文课本可以按照教育方针和主编者（们）对这个方针的见解，定出该给多少汉字，该给那些汉字，以及该阐明那些汉字中的那一个义项，课本完全有这种权利；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主编者主持下的语文课本，可以对语言现象作不同的处理，至于那种处理更有用些，可以让实践来检验。词典不能作出象课本这样的选择。无宁说，词典要记录、描述、整理较为一般的、大范围的语言现象，不管主编者愿意不愿意。当然，毫无疑问，语文课本所给出的汉字和词儿和表现法，首先是从常见和惯用入手的；排除常见和惯用词汇来编初级、通用、一般语文课本，这是不可能的，编出来也是不实用的。在这一点上，词典（字典）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常见惯用的语言因素的。

再一层意思。所谓“常见”，“常用”的概念，有些是全民性的，譬如“一”字，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有些却不是全民性的，譬如上面提到过的类似“大葱”“生姜”的词儿（注意，我是说“类似”）。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常见习用的，那部分人不常见不习用；这部分人不需要查字典的，那部分人需要得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发生在我以为常见，在别人就以为罕

见。讲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回忆起十年动乱期间一桩事。某地把英语教师连同学生拉到农村去，让教师把农村中惯用的农具和农家生活用具译成英语教给学生，什么箩筐筐筐，坛坛罐罐，耖耙铧耧，条播、点播、撒播之类，当然这位同志一时找不到英语的等义词来对译，于是某些人们就哈哈大笑，证明所谓“理论脱离实际”，最后证明“臭老九”无用——我当时看了，听了，确实很难受。我想莎士比亚那么大的词汇学家被拉到这样的场所去，也只能瞠目结舌的。因为这部分词汇他不熟悉。同样，城市里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电视，频道，天线，煤气，液化石油气，暖气，冷气，空调，电冰箱，半导体，诸如此类；目前的农村，很多大人都说不清这些是什么东西，别说小孩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环境同城市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记录反映这些生活环境的词汇，就不能不被一部分人所常用，而被另一部分人认为罕见。因此，一部词典的编纂者，很难准确地区别、判断出所有的字和词，说明那个词是全民常用的，那个词是那一集团的人群常用的。对于词典编纂者来说，全民常用的或一个集团人群常用的字或词，当然要经过调查研究，推理论析，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在通用的一般语文词典中，编纂者只能把它们通通收进去，以便不常用的人可以在这上面找寻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能有别的选择。或者说，作出别的选择（例如在一般公用词汇中去掉所谓常用语词），只能招致片面的效果，实用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一层意思。汉字中某些常用的字和词，往往具有罕用的僻义——如果词典不收这种僻义，尤其是中型或大型语文词典不收这种僻义，那么，词典就很难起到它的被人查考的作用。还是以“一”字作例。《老子》里“道生一，一生二，”其中

的“一”，在当代是僻义，是很费解的，《辞海》新版释为“这里的‘一’指从无形的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这释文也是不易解的，可能它拘泥于道德经，也只能这样解释。说“一”就是“混沌之气”，那么，下文“一生二”，混沌之气又生出什么来了呢？这类东西，恐怕只能在中国哲学词典这类专科词典或百科全书中来寻找妥贴的释义了，不能苛求于语文词典（那怕是大型的兼有百科性质的语文词典）。我在这里举这个例，不过是论证最简单的最惯用的字（词）有时会引起很不容易解释的特殊意义，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再一层意思。“一”字虽然常见惯用，但是词典有义务去综合描述或记录这个常用字的多种表现形式——而这多种表现形式中，有些是为人忽略的，有些是某一层人（例如年青人）所没有注意到的。我欣赏《辞海》旧版中的这么一段解释：

“按一，近世公牍帐簿记数多作壹，商码作Ⅰ，阿刺伯数字作1。”
又说：

“乐谱表示声调之名称，或作乙”。

“注音符号韵符之一，读如衣，单韵。”又，“本韵符写法有二：竖行作一，横行作Ⅰ，国语罗马字母为I。”

这里给出的信息是很有趣的：

$\text{—} = \text{壹} = \text{|} = 1 = \text{乙}$ （乐谱）= 注音符号（竖行）= I（国罗字）如果还可以给信息的话，则作为数码符号的“一”，在罗马人来说，

$= \text{I}$ （大写的拉丁字母）。

我说这些信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词典往往是（或者在某些场合是）有趣的读物，它常常会给出人们习惯上忽视了或遗忘了的信息。例如当代青年人不大习惯帐簿用字（也称为“大写”数码），但是现实生活，写张收据之类，又常常要求用

这种字，当他不知道或忘记了“一”字的帐簿用字（大写数码）时，一查字典，得到“壹”的信息，他是多么高兴呀，他就说：这部词典真有用——于是他从心底里感谢词典的编纂者。我说“有趣”，就在这些地方。

顺便想到一个问题。汉字有它独特的形体发展的历史，因此，在大型的通用汉语或者大型的古汉语字（词）典来说，（例如在编辑中的《汉语大字典》，和《辞源》修订本），值得考虑在每个汉字下面收载能够搜集到的形体变化，比方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大篆、小篆、草书，等等方面的材料，这对于研究和解释汉字内在的特殊规律是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人诸桥辙次在他的十三卷本《大汉和辞典》中这样做过了，（瑞典人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词典显示的是音值变化〔时代的和地域的〕），张瑄在香港出版的词典也在字形方面做了一点工作^①。我以为字形的变化很值得词典界的重视，在某一种意义上说，甚至比音值的变化，更为当前使用者所欢迎。我们的汉字的字形直到现在还不断在变化着，我指的是简化字。有时是群众在那里促它变化，有时还得加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即规范化努力）。

汉字字形的变化同释义有若干内在的关系，这本来是文字学的范畴，但是在词典编纂学上它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这一点，同使用字母拼音的文字不同。拉丁系统也好，斯拉夫系统也好，作为拼成单字的基本材料——字母，不过二十几三十几个，展现这几十个字母形体上的来源和变化，是比较容易

①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全十三卷），1941，大修馆。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Vienna. 张瑄：《中文常用三千字形义释》，1968，香港大学出版社。

的，所以西方一般语文词典里很少注意字母形态的变化。无论牛津系统的词典，还是韦伯斯脱系统的词典，对此都是不予论列的。麦美伦公司1974年出版的一部《学校用英语词典》^①，二十六个字母都有它的渊源，有点象我们的文字源流那样的味道，是很别致的——比方A字下列举了1.闪语文ΑΑ，2.腓尼基语𐤀𐤀，3.早期希伯莱语א，4.公元前九世纪希腊语Ϙ，5.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语ΑϚ，6.英语A，还有一段简洁的很有启发的说明。这样的释文是在当代西方语文词典中不多见的。至于我们汉语，眼前还没这样的词典，而我和一些对语言文字有兴趣的同志，包括我所曾接触过的某些中学语文老师，都盼望有这么一本词典。

2

接着要阐述的一个问题，是释义的排列次序——这个问题是词典界所熟悉的，在不同时期引起过争论的问题。我想用一本词典的两个版本对照一下，即《四角号码新词典》第七次修订本(62年)和第八次修订本(77年)。前者列七个义项，后者列十一个义项。请看：

- | | |
|-----------------|----------------------|
| ① 数目名 | ① 数目字 |
| ② 统括全体的词(一切，一概) | ② 专一(一心一意干革命) |
| ③ 划一(统一) | ③ 满，全(一屋子人) |
| ④ 专一(一心一意) | ④ 划一(统一) |
| ⑤ 同样(一色一样) | ⑤ 相同(一样) |
| ⑥ 另外(一名，一说) | ⑥ 另外(一名) |
| ⑦ 每逢(一想，一听) | ⑦ 稍微(看一看，谈一谈) |
| | ⑧ 与“就”呼应，每逢(天一亮他就起床) |

^① William D. Halsey, «School Dictionary», 1974, New York, Macmillan.

- ⑨ 乃, 竟(一至于此)
- ⑩ 放在“何”字前, 表示程度深
(一何怒)
- ⑪ 旧时乐谱记音符号之一。

第七版有 7 个义项被第八版沿用了, 第八版增加了 4 个义项(即 ⑦, ⑨, ⑩, ⑪), 其中两个基本上不是现代汉语的释义(⑨, ⑩), 还有一个是音乐符号(⑪)。增加这几个义项, 使“一”字得到更多的释义, 有助于阅读非当代文体的书籍, 这当然是可以的。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这些义项的排列, 在两版中有所不同, 有什么非这样改动不可的理由吗? 这就是排列义项的原则问题。大约词书义项的排列, 基本上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按历史语言发展的顺序来排, 最原始的意义放在最先, 然后逐步发展, 当代的使用法则放在最末项。如英国牛津大字典(O.E.D.)^①就是这样办的。另一个极端是按常用的频率来排义项先后, 用得多的, 排在前, 用得少的, 排在后, 现代有号称用计算机来计算每个字每个义项的使用频率, 然后排列的——我写上“号称”, 是表示这里面有吹嘘之意, 似乎不是每一个字每个义项都经过这样周密的调查的。人们说美国“任意”出版社(Random House)的英语词典^②中关于义项频率的调查, 是利用了计算机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然可以

① 这部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原名叫做《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按照历史原则来编纂的新英语词典)。

② 指《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据说它使用计算机来调查某些单字义项使用的频率。例如 terrific 一字, 经过调查, 认为现代用法, 多半作 extraordinary great or intense (十分, 极其)解, 故把原义 terrifying (可怕)排作第 2 项, 将常用义排为第 1 项。

有种种弹性，但大体上以常用的词义放在前面，僻义放在后面，是得到读者欢迎的。至于专门以研究语源为任务的词典，又当别论。《四角号码新词典》第八版改了第七版的几个排列次序，如②变③，③变④，④变②，看来是说不出什么重大理由的。如果没有重大理由，一部词典的修订本最好还是按原本来排列。因为是在修订，而不是新编。我们过去的词典很少经常进行修订，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今后我们的政治环境稳定了，修订的工作就应当而且可以经常地进行，这就必须严格遵守一条规矩：原来错的，把它改正；不错的，就不要另出心裁去改；原来不够确切的，把它改得更确切些，这叫做精益求精，而不必硬是为改而改，更加不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突出增加一些口号式的东西，这是有害的。有一部词典编了二十年，编纂者弄得痛苦不堪，为什么？每一次运动都带来一次大修改，结果语文质量没有提高，只是政治口号式的东西变来变去。有时实在很可笑的。比方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拼命的去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于是词条立了，释义也按此胡诌了，举出用例也是漫骂式。今天骂某甲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明天某乙倒了，又骂某甲、某乙通通都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然后某甲平反了，又改为只剩下某乙在鼓吹。历史随便你去揉，爱骂谁就骂谁。有一部词典按当时的“风尚”，大批“林彪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试问林彪是以极左面貌起家的，他把一切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你这释义从那里说起呢？到“四人帮”被粉碎，又换一下“时装”，改为“四人帮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行吗？编辑当然不要做“风派”，词典编辑更绝对不能做“风派”；当词典编辑成为“风派”时，他不但害了读者，也害了词典本身，叫做害人害己。话说回来，修订词典要尊重前人的劳动，要尊重历史，要讲求实效。